

中国经济转型须铲除“达芬奇现象”

本报评论员

在“毒奶粉”阴谋未散、“瘦肉精”灼痛神经、山寨版 iPhone 招摇过市的时候，达芬奇家居公司造假的丑闻又曝光了。一个号称百分之百原装进口的高档家具品牌，居然是在东莞一个并不高档的家具厂生产的；为了以假乱真，给产自本土的家具穿上洋货的外衣，“达芬奇”还煞费苦心地将这些家具到意大利“旅游”一番。这一鱼目混珠的“好戏”演了多年之后，终于在央视记者的调查下穿帮。目前，众多上当受骗的顾客纷纷投诉“达芬奇”家具，又一场消费者的维权行动在中国多个城市轰轰烈烈地展开。

据媒体报道，在“达芬奇”造假被曝光之前，该公司业绩颇佳，已实施 A 股上市计划，并聘请国内知名证券公司担任其上市辅导商。如果是上市之后再发现问题，“达芬奇”造假的流毒已然污染资本市场，届时，该公司造成的恶劣影响将会成倍放大，所幸的是，这一假设并没有成为现实。

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古已有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也被上了高科技、洋品牌和时尚概念等掩人耳目

的漂亮外衣，“达芬奇”家具就是这样。一个“与时俱进”的现代造假企业的典型。三聚氰胺“毒奶粉”、盐酸克伦特罗“瘦肉精”以及山寨版 iPhone 等，都与“达芬奇”家具相类似。广而言之，国外“野鸡大学”兜售的注水学历，譬如“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学位”等，也与“达芬奇”家具的本质相同。凡此种种，可称之为“达芬奇现象”。

以次充好、以劣充优、以假乱真，是“达芬奇现象”的本质所在。在中国，这种绝非孤例、蔓延于各个行业的“达芬奇现象”，不仅损害了厂家的商业声誉，也污染了社会的诚信体系，从而给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健康运行埋下了深重的隐患。20年前，“中华第一小商品市场”汉正街因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而彻底没落；眼下，“中国第一电子商品市场”华强北由于山寨版信息科技产品盛行而雄风渐衰，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的案例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完成从全球产业链低端向高端的跨越，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飞跃，是中国正在推行的经济转型战略的重要目标，为达致这一目标，中国政府运筹帷幄、精心规划，

企业界也厉兵秣马，雄心勃勃。这些因素固然都很重要，但是，我们却忽视了对经济转型而言同样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那就是清洁的商业环境与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达芬奇现象”的日益蔓延就是明证。

很难想象，一个热衷于制造和使用山寨版高科技产品的民族，能够形成对知识产权的敬畏感，并以此为契机，召集科技创新大军，推动“中国创造”兴起；很难想象，一个本土奶制品行业因藏污纳垢被国民嫌弃的国家，能够持续有力地提升本国产品的竞争力及其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很难想象，一个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成灾、劣币驱逐良币的商业大环境中，能够孵化出民族品牌的百年老店或常青树；很难想象，一旦掌控着社会资源的精英群体习惯于借助注水学历来装点门面，将虚荣誉置于诚信之前的猥琐做法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会自觉养成对于中国富强大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以上设想，固然有“从重”、“从严”的成分，但是，历史的沉痛教训一再告诉我们：对于弄虚作假现象给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的伤害，我们宁可估计得严重一些，而不应总是习惯性地用“流风是好的，抹黑的只是个别”这一陈旧的反思路来说事，惟其如此，才能

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扶正祛邪，让弄虚作假行为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难有藏身之地，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愈演愈烈。如此，方可造就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生长的土壤，而这恰恰是中国经济实现转型的重要前提。

具体而言，消除“达芬奇现象”应从四个方面痛下功夫。首先，将诚信体系的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并辅以相应的制度保证，其中，法律监督应成为核心手段。其次，政府部门应带头履行诚信，言必信，行必果，以为表率，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动辄失信于民，尤其是对于所作出的惠民生的承诺不兑现。其三，构建包括法律部门、社会公众、新闻媒体、民间机构（NGO）、评级机构、金融机构、政府机关等在内的多维互动、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改变过去那种过度倚重国家权力、成效不大的监管方式，让欺骗、危害公众的弄虚作假行为无所遁形。其四，提高影响公众的弄虚作假行为的犯罪成本，一经查实，严惩不贷，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罚不抵罪。

回归单位建房动议是开历史倒车



肖国元

一个幽灵，一个呼唤回归单位建房的幽灵正在中国大地徘徊。早在今年“两会”期间，就有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提出过单位参与保障房建设的议案。最新动向是，房地产市场发育早、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广州也出现了类似的呼吁。据媒体报道，日前，在全国人大代表调研广州保障房建设过程中，不少广州市人大代表批评“广州在单位集资房、自建房方面政策大保守”，并提议“广东应该解放思想，放开单位集资房”。

而广州市住房保障办的官员在回应“企事业单位自建保障房，会不会成为变相福利”时表示，“业上用自有土地建保障房，从立项到户型设计，都要接受政府监督，房价由物价局审核，受惠人群即使是本企业员工也必须符合保障房的条件，不会变成‘变相福利’”。事实上，2011年以来，随着政府保障房建设的展开，一些人，主要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提出了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参与建设保障房的建议。另一些人则顺势而为，提出了恢复单位集资建房的做法。面对房地产市场的困境，这样的建议与主张颇有号召力：一方面，借此可以扩大房地产供应，解决部分人的住房困难；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商品房的市场需求，有利于调控高企的房价。这不正是眼下轰轰烈烈、持续了多年的房地产调控意欲取得的最终成果吗？更重要的一点在于，面对繁重的保障房建设、管理、运营重任，陷身其中的各级政府乐于寻找一个替代方案，从而让自己摆脱目前的窘境。

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弄清楚一个问题：允许单位自建保障房，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重新开放单位集资房，究竟是思想解放的表现，还是打着创新旗号的胡搞？众所周知，1998年福利房制度改革以后，曾经一统江山的与单位挂钩的福利分房制度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给它陪葬的还有包括集资房在内的形形色色的以单位为核心的房屋供给模式，取而代之的则是市场化的商品房供给制度。虽然市场化的制度不尽完美，甚至还带来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与过去的福利房制度比，则是一种明显的进步。客观而言，实现住房供给市场化以后出现的问题，绝大部分不是这种方式本身产生的，而是配套政策不到位、不给力的遗毒。而且，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看，市场化的房地产发展模式是解决住房问题的主导模式，是房地产市场的主战场。

历史告诉我们，所谓的单位保障房、集资房制度，就是以单位为运作主体、以自有土地为基础、以自有资金为纽带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的房屋供给安排。在这样的制度下，单位之间行政属性与资源占有之间的差别会反映到员工的住房福利上。通常的

情形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垄断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具有雄厚的行政资源与经济资源，可以从政府手里批地拿地，可以动用企业盈余、财政拨款等用于单位的住房建设，员工因此可以享受较为优厚的住房福利。而其他单位、企业、个人则只能靠边站，望房兴叹。这种对比强烈、反差明显的住房景观，曾经是一道风景线，存续了半个世纪。然而，在那样的住房制度下，即使有人因“单位好”而不愁住房问题，但房屋的品质、住房的维护保养以及其他配套服务也是乏善可陈。可以说，那是一种低效的、缺乏公平公正、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住房制度。

如果我们再回到过去，允许单位自建保障房，开放集资建房，会产生以下严重后果：

首先，上述制度是以单位为为基础的。所谓单位，尤其是拥有可以用于建房的自有土地的单位，肯定不包括大量中小型企业、私人企业，而众多自谋职业者、自由职业者以及其他无单位的民众等不可能享受单位自建保障房的福利，也不可能集资建房。如果单位没有建房用地，能从政府手里拿地的，也非大型企业、垄断企业、政府机关等莫属。这毫无疑问会触及住房的社会公正性问题。2011年以来政府着手实施的保障房制度是以开放性、公平性为基础的，是要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待与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而不是选择性地解决某些单位员工的住房困难。因此，以单位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具有难以克服的狭隘性。

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表明，面临住房困难的是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城际之间的流动人口、刚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的学生以及没有挂靠单位的低收入人群。如果恢复单位建房的老旧做法，那么这些人群的住房问题是不可获得有效的解决。也就是说，允许单位自建保障房之类的政策会产生房地产供需错位的结构性矛盾。

其次，无论是单位自建保障房，还是集资房，都会严重冲击已经市场化的、有效率的土地供给机制。如果单位已经拥有了土地，就存在用地性质转换问题，即由工业用地变成住宅用地。在不存市场竞争的前提下，土地的价格如何确定？如果先前没有土地而要向政府申请，也同样存在地价如何确定的问题。如果不选择市场化的供地路径，那么不仅过去政府拥有的庞大的卖地收益不见了踪影，而且会大幅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极大的浪费。

其三，以单位为基础建设保障房，实际上是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完整的市场切块分割，弄得七零八落、鸡零狗碎，由此房地产的专业化、规模化大打折扣，降低了房地产行业的整体效率。房地产改革以来逐步发育成熟的设计咨询、承建施工、管理以及中介服务体系将面临巨大的冲击。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恢复单位建房与开放集资建房，既不公平，也缺乏效率，是得不偿失的昏招。

可以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体系完整、配套完善、效率较高的房地产市场，它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与住房紧张问题的缓解立下了汗马功劳，已经成为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与住房供给的主战场。目前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不是市场制度本身带来的，而是政府修正市场失灵时有所缺位所致。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有针对性地弥补市场的不足，加大政府的拾遗补缺功能。

“合谋”才是土地闲置真实原因

马涤明

据国土资源部最新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查出闲置房地产用地2648宗，面积11944公顷。如果把把这些土地换算成实际商品房供应，以平均容积率2、每套住房90平方米计算，将会增加270多万套住宅。按人均30平方米计算，将会解决800多万人的住房问题。

土地闲置晒太阳，是个老大难问题，多年无解，关于其原因各方各有说辞。一些开发商称，拿地而不能如期开发，主要是政府原因造成，比如规划一调再调；地方政府及国土部门也说，政府原因造成的延期开发，情况很复杂。因而在“严打”囤地政策中，特别强调“对确因政府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例外。现实情况是，面对土地大量闲置，开发商大手笔囤地不但没有风险却坐地生财。有关方面虽然对土地闲置屡出重拳，但屡“打”无果，以至于公众舆论口诛笔伐，严重质疑所谓“严打囤地”的真实性，甚至有人调侃说，那么多政府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事连“农村老太太都不信”。

不能否认，地皮晒太阳的原因肯定有政府原因及其他客观原因，比如拆迁拆不动，因涉及地块利益的居民不满而调整规划等原因。这种情况政府无偿收回地块就不合理。但是这种情况很普遍吗，甚至占到90%、99%以上？不可能。然而现实情况则是，

差不多90%甚至更高比例的到期未开发土地安然无恙。若不信，国土部门不妨公布一下立案查办、收回土地的情况有几宗？有几家开发商因囤地受到查处？实际情况是没有几宗，也没有几家。

2009年9月，国土部又一次发出第N次警告——时称“最严厉的警告”，说“非政府原因造成商品房用地闲置的将严惩不贷”。以我的理解，如果“非政府原因”不是特别多，该不会有这种“最严厉的警告”吧？而面对“最严厉警告”，任志强任总不愧不忙地说，开发商拿到土地要调研市场、研究规划、申报审批，政府任何的调整政策都会让设计周期成倍增长；90/70政策出台之后，大量的设计不得不推翻重来，土地自然要晒太阳。”可是大家听说过吗，任总的华远地产这些年开发过多少套“90/70”的房子？因为这项政策调整规划的开发商又有几家？绝大多数人是把理由硬往“政府原因”上赖。

经常有报道说，土地晒了一些年之后自然升值多少个亿，最多的超过200亿。如此利润诱惑下，我们如何相信在“政府原因”之外没有商人逐利的贪婪原因呢？既然“政府原因”造成的土地闲置不可能很普遍，“严打”却又很少见到什么人受伤，土地闲置究竟是合理的情况多，还是合谋的情况多，我们合理想象一下，不得不出答案。



索罗斯金盆洗手

索罗斯称将退休，金融大鳄走还留。曾经黑手覆云雨，如今白发写忧愁。量子基金铸伟业，投资天才逞风流。将来只管家族事，英雄岂甘居幕后？

唐志顺/画 孙勇/诗

美债风险中国担发人深思

彭兴彪

美国债务上限谈判局势近日急转直下。据报道，美国白宫和国会再一次谈判破裂，一直表现冷静的总统奥巴马难掩怒火，首次承认有可能发生债务违约。据报道，美国已“彩排”债务违约后的救急措施。这让人们不禁担心这将给刚刚出现复苏迹象的全球经济带来更大危机。美国如此“绑架”世界经济，也引发全球市场巨大担忧，避险情绪不断升温。

自1994年来，人民币就事实上采取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于是，在“出口创汇”的口号声中，中国开始不遗余力地囤积美元。时过境迁，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出口贸易的异军突起，美元开始“泛滥成灾”。截至2011年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已达31974.91亿美元，而其中70%是美元资产。凯恩斯有言：“当你欠银行1万英镑时，你受银行摆布。当你欠银行100万英镑时，银行受你摆布。”作为美国最大的外国债权人，中国陷入了“美元陷阱”。

美国负债累累，当我们需要动用外汇储备的时候，美国还得起吗？一旦美国陷入债务危机，采用的方式无非外乎三个，一是违约，二是通货膨胀，三是美元贬值。上述任何一个手段，都将可能使其债务归零，而中国的美元资产将完全打水漂。在历史上，美国也并非没有违约的先例，例如，1933年，在美元贬值41%的同时，美国国会废除了美国国债的黄金条款（the gold clause），美国国债购买者不能再按原有契约取得相应黄金；1971年，美国单方终止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性，也是一种违约。

其实，美国早已开始行动。从2004年至今，美元贬值了60%左右。当然，为了维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和美国自身的金融稳定，美国会继续实施“强势”美元政策，不会让美元大幅贬值，在这时，强迫贸易对象国货币升值是美国的惯用手段。指责北京抢了美国民众的饭碗，不但经济正确，而且政治正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成了美国失业最方便的替罪羊。此外，用通货膨胀摆脱债务负担在历史上则是屡见不

鲜的办法。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一再指出，如果美国的财政赤字继续上升，“用通货膨胀摆脱债务的诱惑将是无法抗拒的。”

中国是一个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外国，现在却陷入“增持美元储备进一步增加汇率风险，减持美元又会导致贬值，使已有外汇资产缩水”的“两难”境地。

按常识，一国的货币要坚挺，必须以这个国家的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和强大的实力为后盾。可现在美国的情况是：“消费的增长在此不是建立在生产扩大、工资提高或者出口增大的基础上，而更多的是以增大负债为基础的”既然如此，为什么美元依然是主要的储备货币？原因有很多，比如没有替代物，美国金融法制健全，国债市场的流动性较强，美元资产的回报较高等等。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非经济的：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具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军事力量，美国在国际条约的制定和意识形态上具有主导地位等等。

毫无疑问，美元霸权的路径依赖十分强烈。《牙买加协定》已实施三十余年，参与这一协定的国家成员越来越多，

这些成员实力不一、利益目标更是不尽相同，这使得建立新秩序的谈判成本十分高昂。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货币会议就多以失败而告终。而且，美元霸权在演进的过程中存在收益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比如，在货币交易中，某种货币使用的人越多，就意味着用这种货币与别人交易就越快和越容易，该货币就越有吸引力，任何新加入的交易者都会对其他人带来正外部性，从而产生收益递增和自我强化效应。

此外，美元已经被广泛使用，这使得美元具有了先占优势。比如，美元市场规模大，而且交易成本低。围绕美元霸权，也已经形成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会竭力维护现有制度，反对和阻碍选择新制度，即使这种制度较原制度更加有效。对于中国而言，中国既需要美元，又受困于美元，在这个陷阱中，中国可供选择的余地并不多。对内来讲，扩大内需、改变过度依赖外贸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十分必要的；对外来讲，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将是一个长期的战略，而就眼前，最紧要的，是顺利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電郵至pp118@126.com。